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一三期 ——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五日报)

本期目录 (zk0211b)

【文献资料】王申酉供词摘录

【史海钩沉】吴宓日记中还有什么？

渔歌子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二十八）

周孜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文献资料】

王申酉供词摘录

〔编者按：王申酉在 1976 年 9 月 9 日，即毛泽东逝世当天被捕。这是他在狱中所写的“供词”的部份摘录，“供词”原是给他女朋友的信的回忆，后来成为他被判处死刑的主要依据。〕

我在 1976 年 9 月 7 日到 9 日写了一封给恋爱对象的信，其内容据回忆如下：

◇ 提纲

1. 开场白
2.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我的世界观
3. 对 1949 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
4. 对苏联历史的看法
5. 对 1949 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看法与对毛主席的看法
6. 对中国目前现状的看法
7. 对双方（我与对方）关系的看法
8. 对双方关系前途的估计。（实际写出时，顺序是有颠倒，标题是有改变的）。

注：在原文中，第 5. 点是用攻击性字眼指向毛主席的。另外第 7. 和第 8. 点没有来得及写。以下

是原信的回忆。(S. D是对方名字的拼音缩写)

◇ 开场白(略)

◇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我的世界观(略)

◇ 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

.....

从1937年起,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这场抗战中发挥了力量,建立了民族的功劳,但各自起的作用的细节,我并不了解详细,没有发言权。这里想提彭德怀的“百团大战”一事,这是因为彭德怀这个历史人物在以后的党内历史中又曾起过重大的影响。彭德怀抗战中任八路军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副总司令,他曾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一百个团左右的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进行过英勇的战斗,严重地挫败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抗战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民族功勋,当然也给八路军本身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损失。这场威振中外的战斗大张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军的威风,受到了举世的称颂,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发布嘉奖令。不论怎样,这场战斗发生在民族矛盾占中国社会统治地位的时期,是有进步性的,应为历史所肯定的。但毛主席当时却批判这次战斗,在党内发表谈话批判,提出这场战争消耗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的力量,在日军面前暴露了八路军的主力 and 动向,从而吸引日军把军事压力增加压在共产党身上。毛主席的想法显然是要尽量保存党的武装力量,以此用来为未来的内战作更好的准备。他没有看到彭德怀的军事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增强实际战斗能力,从长远看并没有、反而会增强党的武装力量。关于这次历史事件过去我从未在书上读到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从大揭发材料中了解了这件事,看到了毛主席的关于这件事发表的谈话,毛主席与彭德怀的矛盾的历史渊源还不止这点,但这点也许最大。

.....

◇ 对苏联历史的看法(略)

◇ 对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看法

.....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党内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甚至为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内大分裂,埋下了祸根。因此,1958年是考察建国后我国历史的极关键的一年。

1958年初的中国经济形态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毛主席当时却不顾中国的现实历史条件,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也就是说,将大致相当于村或几个村的高级社扩展到相当于乡或几个乡规模的公社,提出政社合一的一元化领导办法。从经济形态上说,是把核算范围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不久又提出把核算单位上升到公社一级,否则无法显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事实上,后来经济成本核算连公社一级也取消了,大搞一平二调、共产风,各种舆论宣传机器都在宣传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农村实行了生产不计报酬,吃饭不要钱,家庭经济也取消,货币经济也濒临取消。我当时正在初中念书,政治老师们向我们讲解《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的语录,与我们一起畅想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景象。

在工业方面，毛又提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二个就什么都好办了。结果各行各业都大炼钢铁，甚至从农业中抽调大量有生力量炼钢，严重打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比例。钢铁是从1957年的535万吨发展到1958年的1,070万吨，到1959年又翻了一番，达到令人可疑的1,800万吨，但其他部门的损失则是极为严重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口号是提出来了，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也提出来了。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人们陷入盲目的狂热之中，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了1959年就开始显露其祸害了，只是还没有被大多数人看出罢了。即使有清醒的人，也多半不敢发表意见。独有那个热血老人彭德怀不仅头脑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无畏的勇气，不顾高龄，奔波到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实地视察，把灾难性的经济形势与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写成了长篇的万言报告给毛主席，结果在庐山会议上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成了党内分裂的导火线。彭德怀并没有搞阴谋，而是通过正常途径写信给中央，也没有在信中追究个人责任，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措施改变过来。彭德怀在写信前曾说过，拚着这身军装脱掉也要干一下，可见他是置个人政治生命于度外站出来的。毛主席看了后果然勃然大怒，用列宁骂普列汉诺夫的话大骂彭德怀。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是同情彭德怀的，但没有办法，结果毛撤了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改派林彪任国防部长。

彭德怀的劝告丝毫没有打动毛的心灵，反而更使他下决心按原来路线做下去。毛搞了个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通令全党，在全党掀起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中央到各地揪右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再没人敢说话了。全国刮起了浮夸风，什么稻米亩产上万斤，甚至几万斤也上了报。可惜我当时还不太懂事，因此不能详述当时大批大批的荒唐的经济笑话。总之，这场经济灾难象一匹野马一样在毁灭性的路上狂奔，到1962年眼看要摔到万丈深渊中去时，才算被缰绳勒住了。

三年后，彭德怀又写了被称为翻案书的信给中央。三年的国民经济困难使1957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许多指标没有完成，从1960年起甚至再也无法向国内外公布国民经济完成的具体数字了。工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究竟这三年造成的经济破坏达到什么地步，让历史学家们去写吧。这里要提的是1962年的中央、省委、地委、县委的七千人干部大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干部大会。矛盾已充份暴露了，再也无法掩盖了，全党聚在一起评价这三年灾难的状况，讨论解脱的办法。毛在会上是处于孤立的地位的，只有林彪为他说话。刘少奇在大会上谈到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提出这三年经济困难的根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中央到省地干部在他的启发下都谈出了真实的各地情况与个人的意见。

党中央面对这样的局面，采取了许多从历史上看是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首先是决定废弃三面红旗的口号，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方针，并规定1963—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66年起再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毛也同意将农村的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实际上回复到人民公社化前的情况，只是为了顾全他的威信，不取消“公社”的名称。但以后的历史学家要作公正的评论的话，只能这样认为，三面红旗是失败了，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毛这时读了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书，读了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多少认识了一些问题。不过他指责各地干部们不懂价值规律，要求大家学点政治经济学，还特别介绍了那本价值不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给大家，并作了一些评注。我想，如果他在1958年注意到这些问题，就不至于提出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吧。

另外，为了团结党内外群众一起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度过难关，党中央还在党内恢复了一大批被冤枉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名誉。邓小平公开说过，反右倾百分之八、九十

搞错了。在党外，也摘了一大批1957年带上的右派帽子。在一些传达到全党的文件中对三年国民经济困难作了比较客观的估计。甚至在拿定息的资本家中，也允许他们借神仙会之类的形式谈看法，揭阴暗面。党内外民主有了不少气氛，人们被允许说话了。如果党好好干，带领人民好好干，中国还是有前途的。

党中央工作从此以后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是由周总理主持，毛主席则不大管具体中央工作了，在全国视察、游历，并让林彪抓好军权。他在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显然他是仍不愿承担三年经济困难的丝毫责任的。但他表面上不能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要各地干部到各地向人们传达他的这个意思。刘少奇真在湖南这样做了，结果犯了一项大罪。

.....

毛主席在1958年的做法，是无法解脱历史的评判的。当时中国一片和平建设的景象，又刚经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速度经济发展，并没有为他的做法提供客观的辩护因素。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现成的，苏联建国初期短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历史教训也是现成的。还有，在提出人民公社化运动时，特别在1959年苏联是明确提出不同意见劝告的。党内以彭德怀为代表也提出了不同意见。所有这些都为评价他在1958年的做法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从1963年开始，党中央又提出在全国展开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使人想起苏联的情况。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向资本主义势力作让步，是为了准备条件进攻资本主义。我党中央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从困境中解脱开来，也不能不采取了许多向资本主义让步的方针政策，如“三自一包”等，这归根结蒂有利于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很难避免这样做。而一旦经济恢复过来，搞社教运动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反攻也同样正确。只是刘少奇的目的是进一步整顿由于三年经济破坏而造成的各地政治、经济瘫痪状态，消灭城乡自发资本主义的势力。而毛主席的目的是把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由于周恩来总理在行政方面基本上是执行了刘邓路线的，因而根据条件的成熟程度，他们早晚也要打倒总理的，只是经过几次回合没有成功，后在去年下半年提出评《水浒》时才公开打出信号。林彪在主持了军委工作后，最大的任务就是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以为未来的党内斗争作准备。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了三年左右，并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就寻求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你我都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对于运动的发展过程就不必多谈了，我所要着重谈的是从理论上粗浅地勾画一下这场运动的历史背景、经济根源。

既然，党内大分裂的最近渊源出在59年庐山会议的彭德怀身上，文化革命的导火线就由江青出马在上海通过张春桥物色到姚文元在《文汇报》刊登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来。此文由毛泽东指明，好处在点了吴晗的名，但未打中要害，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毛在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但此文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彭真搞了1966年的二月提纲，只把这件事纳入学术范围讨论。北大文科起劲地翻阅上千万字的海瑞资料，没有想把事情闹到政治问题上去。碰巧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在1964年秋开始的北大社教运动中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有矛盾。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夫人曹轶欧的直接指示下在5月25日贴出了《陆平、宋硕、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把火烧到北京市委身上（宋是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康生在6月1日向全世界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于是文化革命拉开了序幕。

我起初对这场斗争性质认识极模糊，以为不过是个个人之间争权夺利。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它来思考事情的本质后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这场斗争的性质归根结蒂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观和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争论的问题的焦点仍在于那个老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形成了空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毛泽东在1965年5月7日写给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信中十分具体、形像地描绘了他关于改造社会的蓝图，这封信最好不过地集中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社会应分割为一个一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共同体——公社。在这个公社中，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不应有严密的分工，都既要学工、又要学农、学军，还要从事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即批判资产阶级。这个公社的生产方式是集体性质的，交换主要发生在内部，因为现实中的农村人民公社正是如此。因而这样的公社显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当然它也与外界发生物质交换，但只是与国家交换，彼此之间是不发生交换的。不过根据现时的实际情况，这种与外界的商品交换只占很弱的比例，公社内部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多半是采取实物形式分配的。毛泽东在信中又只字不提这种集体生产方式需要用大机器进行物质技术改造，自然根据每个人要从事不同行业的劳动这一点来看，公社社员是不会被要求从事大规模的分工的协作的。既然生产方式是这样的，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必然由这种生产与交换及分配方式决定是封建家长制性质的。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唯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来源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结果这样的公社自然会尽一切力量防止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的侵蚀作用，而每个公社社员又由法律规定是无法脱离公社的，世代要生活在祖传土地上，从事各种劳动，并且永远保持固有的生产方式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这样的村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如西方的克兰制、马尔克公社，东方的印度和斯拉夫公社。不过，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这种公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

毛泽东在工业方面的创造，是1958年提出的《鞍钢宪法》，即二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在这里，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是不太困难的。这里不谈了，只是顺便提一下。要谈论生产，就要抓住生产、交换和分配问题，而鞍钢宪法都没有提及，只提倡取消分工。

当我们考察历史人物的作用时，当然不是根据他自己谈的看法为标准，而是根据他的实际行为，不能根据他的个别言论判断，而是根据一贯的言论、著作和实际作为。在林彪的指示下，叶群、吴法宪在江省太仓县洪泾大队蹲点搞了一个典型。（正是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蓝图的实际例子），在1967年中起作为样板向全国推荐，其中特别宣传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年妇女顾阿桃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

如果学习马克思主义只限于书面的概念到概念，不接触现实社会，那么只会变成学究书呆子，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当时，我还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根本就不懂。但预感到叶群搞的那个样板将是今后中国社会形态的缩影。为了能先接触、适应一下这种社会制度，就主动报名与班上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一起去洪泾生活了半个月，实地体验生活。现在，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回顾这些日子的见闻，是很有启发的。那里的社员们一天到晚在搞斗私批修，无论同访客们作的大规模讲演还是生产队会议，甚至在家庭会议上，都在搞斗私批修。所讲内容无非是头脑里产生了私心，如何通过学习，即林彪所说的“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后“立竿见影”，战胜了私字，建立了公心。林彪是一贯鼓吹精神因素第一的政治骗子。在他看来，“一担粪，是挑在大田里，还是自留田里”，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原则区别。在他看

来，只要在人的头脑里强制灌输某种道德教条，就能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从而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在我读过的任何马列经典原著中，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只要进行单纯的道德说教——事实上往往是禁欲主义的基督教的变种——就能改变生产关系本质的说法的丝毫痕迹。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批判过那种“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结蒂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如果说林彪指的“私”字就是指的物质利益，那么他那套粗陋的原始共产主义谬论只能从原始的基督教义中寻找根源。顾阿桃是个文盲，连字也写不来，据说原先是个充满私字的普通社员。后来在叶群等培养下，用图画来表达自己斗私批修的情况。可见，林彪的教义只能从最落后的社会阶层中找到微弱的基础。而后来林彪一倒台，顾阿桃也成了笑柄。

按林彪对于经济关系变革的观念，他在上层建筑也采取了相应的办法。1968年1月从上海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军事专政，基本上类似于秦始皇的郡县制度，以适应经济基础。

.....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过去后，迫不及待地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制度，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技工作十几条。召开全国托拉斯会议准备大搞托拉斯企业等等措施，都无非为了一个目的，让价值规律起最大的历史有益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无疑，所有这些，历史都会作出肯定的结论。

从上面的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两种性质对立的世界观、路线在党内历史发展中，在民主革命阶段没有什么大分歧，在1956年八大以前有小分歧，从1958年公社化运动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到了文化革命时期就成为你死我活的分歧了。分歧的焦点也许仍可以列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应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社会主义？

◇ 我对毛主席的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第五部份谈了不少，这里不详述了。坦白说，我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和理论能力来谈论对他的看法。只能说，我对他的世界观，他的改造世界的蓝图，他的一切言论（在文化革命中有机会阅读了大量从他青年时直到文革中的未公开刊行的著作）和作为的极肤浅的了解，只给我头脑中留下很浮浅的轮廓。他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求学前又参加过农业劳动，但后来在湖南省会长沙一师的求学时期学习了大量有益的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狂热地学习革命的道理，刻苦地锻炼自己的体质和意志，在一师发起了组织《新民学会》这一革命团体，并投入了反对封建军阀政府的斗争。他青年时发表的不少文章曾激动过我和许多青年的心情。我和不少青年学生积极卷入文化革命的政治运动在不小程度上是出于对青年毛泽东的崇拜——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只是我们曾好久弄不明白，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地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当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为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

他在长沙一师毕业后做一个小学的校长，但仍没有停止革命活动，不久成为职业革命家，去北京、上海等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活动。在北大图书馆作管理员时，在馆长李大钊的启发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来与一师时代教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结婚（她后来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1921年7月，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另外11名代表加上共产国际的代表（苏联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此前结识了周总理等人，曾在上海南市区半淞园路地方送

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人们也请他去，他认为国内的事够多值得研究了，故没有去。这实在是一大缺憾。在1927年前的国共合作时期，他成为国民党的官员。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转下地下，九月份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从此直到解放，基本上一直在农村工作，与农民打交道。

由于出身与革命的大部份时期在农村，使他对农民阶级十分熟悉，了解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经济要求，因此他能成功地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他对农民经济状态作过调查，但调查报告没有收入毛选。此文以前偶在一家旧书店读到过这份报告，也是很简单的，没有作归纳、整理、分析，故没有实际的文献价值。他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在文革中听说去过安源煤矿几次，但具体的活动情况不知道。

总之，我还没有看到过他对于中国经济形态（无论是农村或城市工业）具体分析文献，甚至解放后他在领导中国实行重大的经济变革时期，也没有发表过这类著作。作为领导这样大的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对国家的经济作历史和现实的详细考察，要领导好国家的建设是很难想象的。从他对社会改造所表述的理想蓝图及实施的方针来看，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条件的认识是很不足的。很可惜，他没有去过西方实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解放前也大概没有去过国内某个现代化工厂、大银行考察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这恐怕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有不少影响。他一生只在解放后出国二次，都是苏联。1950年去订中苏友好同盟条件，1957年去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

林彪的出身与人个经历是更单调狭隘。中学毕业后去黄埔军校读书，才几个月就和北洋军阀打仗，南昌起义时是个连长，以后一直在军队里混，由于党是靠武装斗争才能存在，他才能上升较快。从能阅读到他的全部作品中来看，绝大多数是军事著作，除此以外便是狂热吹捧毛泽东的文章，对除军事以外其他领域的东西大概全是一窍不通的。他鼓吹的唯心主义的教条，鼓吹精神因素的决定作用表明他的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他在政治上只会搞阴谋诡计，只学政变经。1971年9月13日事件遭丧身之祸后，为全国、全世界人笑骂，我从未听人真心讲过他一句好话，他将像赵高一类人那样遗臭万年。死后被揭发，他搞过《五七一工程》政变纲领。不知他死的谜几时能够打开。

刘少奇出身大地主，中学毕业后投身政治运动，曾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入党。他在安源工人中活动了较长时期，后在党内也长期担任工会工作、白区工作，与城市、与工人接触较多。

周总理出身在浙江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在天津南开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后来与邓小平、李富春等人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成立中共旅欧支部，他曾去好几个西方国家活动，对西方了解很深，国共合作时期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国共分裂后他在27年8月1日组织南昌起义。周总理其人，无论从才能、智慧、人品，还从毅力、精力来说都是举世敬仰的。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在近几年中不断扩大，在他临逝世以前，双方的矛盾无法弥合，几乎差点就完全暴露于世了。

◇ 关于近两年来党内斗争状况

我是抱着十分灰暗的心情提这个问题的。由于消息来源很少，有些不一定确实，故只能作你参考。我当然力求从历史的渊源谈，根据尽可能可靠的事实谈。由于这场斗争关系着我党我国今后的前途、八亿人民的命运、世界政治的风云，我们作为普通的百姓，虽然没有丝毫力量去影响这场斗争的结局，只能袖手旁观，但实在因为这场斗争到了十分激烈、致命的时刻，稍有一点热血的青年都应关心一下。如国家完蛋，党完蛋，个人还有什么指望？在林彪垮台以后，

毛主席曾一度打算培养姚文元作接班人，但犹豫了一段时期后放弃了这个打算，原因有种种，我不能乱说。但可提一点，姚是复旦大学旁听生出身，典型的知识分子，很难设想会被选中。后来就看中了王洪文。毛主席在1967年在上海与王认识并长谈了二次，并目睹他批砸了“联司”，这成为王洪文后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的起因。王农民出身，参军入党复员后在国棉17厂当人保科干事，他的农、兵、工经历成为他的一张王牌。1968年2月江青、张、姚在怀仁堂得罪了二位老师，二位副总理（陈、叶、李、谭），王未介入，故王能上升得更快，九大成为中央委员，十大当上副主席。大概到1974年下半年的时候，毛主席选定他当接班人，一起接见了几次外宾，其中最有名的是法国总统蓬皮杜。但据传说出了洋相，他伸手时，外宾不理睬他。故从此又丢开了。林彪势力在1972年至1973年间从中央到外地被清洗，换上了起先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这是默默进行的，但步骤是稳定的，在江西的中央办公厅干校隐退了几年的邓小平回到了中央。

总理在1972年得病，这是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他选定了邓小平继承遗志，这绝不是偶然的。邓小平也许是总理一生最长久最亲密的战友了，在半个世纪前的20年代初就相识并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当时一起的有李富春、蔡畅、蔡和森、陈毅等人。在法国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邓小平学识渊博，人们称他为“百科全书”。个性光明磊落、生性耿直，工作有魄力。总理每次出国访问，全由邓小平任代总理，代管国事，事实上是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又是党的总书记，统管着全国党的组织、人事，组织能力极强。当老干部们在全国各地代替林彪势力执政后，邓小平来京是有稳固基础的。

不过，邓小平执政前就经历了一场斗争。1974年初，发动了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一方面固然为着肃清林彪的影响，因为林彪一直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他的余党江、张一伙总感到极“左”派帽子像头上的疮疤，别人一骂就痛在自己头上，故要通过这场运动把林彪搞成极右派，再把矛头引向总理及一大批中央到地方的老干部。另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法家人物，把总理打成“儒”家。到了1974年年中，就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史的学习运动。上海市委在动员报告中明确说明，学习法家著作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也就是说秦始皇的统治法制对他们的统治有现实意义。从孔老二到董仲舒、司马光等一大批儒家人物被大肆诋毁。当然，宣传历史斗争纯粹是为现实服务的。不过这种舆论听众甚少，到年底就逐步沉落下去了。毛主席让邓小平出来，但斗争还是在进行。

1975年1月，邓小平任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总参谋长，党政军有了权。只是八亿人还无法想象这位在文革初期横遭污蔑的人物后来竟会那么不顾个人委屈、极有魄力地干出一番出色的事业来。李先念副总理也明显突出，与邓副总理交替出来接待外宾。李副总理同样是总理五十多年的老战友，在总理手下当了长期的财政部长。文革初期，林彪一党操纵“五·一六”等一帮爪牙，捏造李副总理当过叛徒的谣言，罪恶滔天。我67年年中去北京时亲眼目睹长安街上炮打他的大批标语。后来总理亲自出面保护，斥责那帮家伙对别人政治生命不负责。因此，我总感到形势不错。加上叶老帅任国防部长，更使人感到安心。四届人大的国务院名单上，不少都是总理的老同事、老部下，几十年来是忠实贯彻总理路线的。我作为教育界里呆了多年的人，看到周荣鑫任教育部长，特别高兴。他跟了总理二十多年，长期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上递报告、下达文件的必经渠道，是总理的心腹的心腹，由他任教育部长，教育事业是有指望的。我读过总理50年代初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使我极为感动。总理在中央一向分管知识分子工作。因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可能贯彻总理的路线，能改变文革造成的灾难性局面。

1975年3、4月，张春桥、姚文元突然亲自出面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提出了所谓“林彪一类”的概念，把极“左”派脸谱描成极右派，把矛头对准总理，攻击其一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攻击其“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

方针。

1975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工业会议上公开唱对台戏，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物质基础，并着手抓起工业问题来。这一个月，在他极有魄力的指令下，在极短时间内就打通了全国长期被阻塞、干扰的铁路交通线，保证了全国交通命脉的畅通，为恢复工业建设创造了极有利条件。

1975年6月，毛远新在辽宁炮制出所谓“朝阳经验”，与清华的迟群一吹一唱捧为全国大学教育革命样板。上海宣传机器也遥为呼应，广为宣传。但是上海闻风未动，在高校里被人们暗暗地冷嘲热讽。全国各地响应极少。

1975年7月、8月、9月，这三个月中中央形势大变，起因是江青事件。30年代上海滩上末等黄色电影演员（职业是话剧演员）江青为了为自己树碑立传，在国际上建立声誉，为日后“大业”作准备，就与一个美国记者谈了几次话，叙述个人生平历史，内容极为下流，还努力吹捧自己在文革中的特殊功绩。结果该记者写成了书在国际上发行，销路极好。主席听了后大怒，急令中国驻美联络处用外汇高价收买该书版权。并发布中央文件，对江青问题作了三点决定。文件只传达到省军级。但国际间偌大一件丑闻怎能堵尽天下耳目？这事在国内也不胫而走。江青一下子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邓小平对庄则栋、马天水等明确指示，以后一切工作不要向江青、张春桥请示了。王洪文、姚文元灰溜溜回上海活动，只想稳固老巢的阵地。国庆节王洪文缩在上海过。

周荣鑫为了打开教育界的死气沉沉局面，授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此人文革前就是该校党委副书记）写信给主席。信由周荣鑫转邓副总理，再转给主席。主席大怒，但当时形势不利，暂时按捺了下来。

1975年9月，陈永贵副总理提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向二级所有制过渡的问题的报告后，主席批示“请各路诸侯议一议”，要邓副总理召集各省市负责人讨论该报告。邓小平召集了12个省市自治区（上海、辽宁不在其内）来京，在京西宾馆开了十几天会。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五位副总理出席，邓小平讲了三次话。会开到十月份才结束。周荣鑫受患病住院的总理委托破格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实际上远不只讨论了陈永贵的报告，而且讨论了全面整顿全国一切工作（九大方面）的题目。12省市的领导全是老干部，全面揭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矛盾，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高举骨头”、“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来收拾全国“积重难返”的灾难性局面。邓副总理十分清楚全国各行各业的灾难性局势，指出再不“扭”转局势，“我们大家全都得完蛋”。邓副总理还表示要“赌咒发誓埋头踏踏实实干它20年”，还向中央表示，不迅速扭转局势，就集体辞职请罪。

9月初，全国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召开。华国锋副总理作了长篇报告。邓副总理也作了报告。值得一提的是，他两次离开了讲稿，指出这次会议的意义可以与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意义相比较。这是极为意味深长的。大家知道，七千人大会是全国人为灾难性局势向形势改善转变的关键。邓副总理明确暗示文革造成了灾难性局势。

毛主席看出了由于江青事件，形势极为不利，邓小平批判江青，而且把钻进国务院搞破坏活动的张春桥丢在一旁，王洪文、姚文元溜回上海，中央到各地的老干部们逐步围绕团结在总理正确路线的周围，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局面，而自己身边则十分冷落。左思右想，想出用《水浒》作题目，在八、九月间发出了开展评《水浒》的运动。指示发表《让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社论，把矛头直接对准总理，指出这是我国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重大斗争。问题的焦点是：主席指责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以外”，并去受“招安”当投降派。

读过《水浒》的人谁都知道，宋江上梁山后从未想屏晁盖的意思（至于他受招安等事姑且不论），他一上山，晁盖就提出把首领位置让给宋江，宋江坚决不受。晁盖再三让位，宋江拼命拒绝，并表示晁盖再不收回这意见，就要下山不来了。在吴用、林冲等人一致劝导下，晁盖才收回了辞让之意。二人在梁山上相处一直十分和睦，宋江绝无卑视晁盖之意。后来晁盖在作战时，被地主武装的头子史文恭射死后，宋江大力为他报了仇，最后被众人推为首领的。况且，晁盖活着时，梁山好汉总共不过几十个，远未达到108人，故要屏也不会屏在一百零八人之外的。可见主席借批林批孔、借搞儒法斗争来整总理都没成功，极不得已，只能捏造小说的故事情节来打倒总理，实在太计穷智尽了。

然而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奋斗、工作了半个世纪的总理，直到身患重病躺在病床上，仍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国家为人民操着心，派周荣鑫部长去宾馆出席会议，不断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并作指示。另外又指示七月份去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搞一个《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委托邓力群起草《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还指示搞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件》，亲自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总理还感到我国当前教育战线上处在奄奄一息的严重局面，特别要求周荣鑫部长加紧工作。在总理指示下，周部长召开了全国性或北京市各教育系统的干部会议或座谈会，讨论面对的局势和改善的办法，准备提出关于教育问题的文件请中央批发。

十二省市负责人会议结束后，各地负责人分头回各省，召集大规模干部会议，传达总理指示及邓副总理的报告精神，并讨论具体贯彻执行措施。

1975年10月、11月，主席加紧评《水浒》的运动。鉴于更严重的利害关系，主席被迫赦免江青，重整旗鼓，开始反击，先从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搞起。发了一个中央文件，提到主席的批示说，刘冰的信表面上攻击迟群，实际上矛头是对准主席的。信是由周荣鑫授意写的，经周和邓小平转主席，而不是直达主席。中央文件点了周荣鑫的名。从11月起，我校发了大量周荣鑫的报告和言论，也掀起敢教育革命大辩论，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

10月份，在总理关怀下，中央召开计划工作会议，邓小平根据总理指示，强调要把文革中下放到地方的大企业收回，由中央统一管理。王洪文、张春桥等指使人唱对台戏。

1975年12月，上海加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校发下胡耀邦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叫大家批判。后来发下江渭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在南昌三级干部大会上传达的中央负责同志（未点名，大家立即猜到是邓小平）的报告，要大家批判。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在9—10月召开的十二省市领导同志会议上作的三次报告的内容。

上海报纸上大肆宣传所谓批判“奇谈怪论”，主要就是上述一些人报告的内容。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国陷于一片悲痛之中。但上海报上无只字反映人民的悼念心情，人们纷纷自发组织召开悼念大会。15日召开中央的悼念大会，邓小平作悼词。人们感到茫然。不久上海街头和复旦校内出现要求张春桥任总理的标语，各单位狂势进行评《水浒》的运动，到处都是关于宋江的漫画，极度丑化宋江。我校编印了关于宋江的所谓罪行的材料让人样批判。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当时关于江青的丑闻在广为传播，批宋江的矛头是对准总理的。

1976年2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的关于清华大学大辩论的报导，显然是迟群按主席意思搞的。此文的矛头明确指向邓小平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在文革中被整的干部。上海掀起了相应的批判势头，但全国大多数省市闻风不动。

复旦、师大校园大开，接待大批单位的大规模参观活动。同时，张、姚等在上海再次加紧搜罗亲信，物色爪牙，摆出一副夺权架势，准备去北京大规模改组中央、政府机构。

我听得中央文件说，叶剑英因病解除了军委主持工作，心中万分难受。经证实后我在人民广场彷徨了一个黄昏，无法平静。

1976年3月，中央文件传达主席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批邓的讲话12条。全国各地被迫搞起批邓运动。但尽管总理逝世，还是决定要打倒总理（总理过早逝世的原因一直是个谜，人们相信是有疑问的。因为11、12月份就掀起搞周荣鑫、搞邓小平的黑风，仿佛知道总理即将逝世似的）。

3月5日，文汇报在纪念雷锋的报告中，删去了总理对雷锋的评语（外省市皆未删），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批判文章中，公然写道，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后者谁都知道指邓小平。关于前者，矛头对谁，也不言自明了。文汇报社电话铃声及访客不断，询问背景。此事引起了全国民愤。南京街头贴出大批标语“揪出文汇报3·5和3·25事件的后台”，常州、无锡也如此，许多沪宁线上的来车用柏油刷类似的大批标语。上海各处反复刷出悼念总理的标语。

同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强制进行，国务院好多副总理和部长都被攻击、批判。在复旦大学出现了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漫画和大字报。有许多迹象表明，矛头集中在总理身上。

1976年4月，这个月的大事是震动世界的。由于南京事件闹大，月初中央发布电话通知，声称要追查南京街头大标语的背景，不许再搞张春桥。

清明节前后全国各地人民自发组织起追悼总理的群众性活动、集会。南京雨花台也召开大规模追悼大会。上海市委预作布置，关闭了烈士公墓。在首都则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详细过程不清楚。但从各种传说中看出，场面是够伟大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自发集会，恐怕五四运动的场面也远不及这样伟大。北京各单位选出最优秀的群众代表前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总理，向总理遗像鞠躬致敬，发誓继承总理遗志，发表慷慨激昂演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悼念的花圈日以继夜送来堆积成一座座山。大的直径有五米，用铝作支架。许多单位由领导亲自带队前来，全厂出动。从三月底开始，人们越来越多地拥来，无数各地的来京出差人员也为这种场面所感动，积极加入。人们慷慨激昂陈词，歌颂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歌颂他对中国人民立下的巨大功劳，数说他为中国人民安排的伟大建设事业的宏伟蓝图，痛斥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无耻诽谤。同时也歌颂了邓小平作为总理的亲密战友，忠实执行总理路线的功绩。广大人民群众还抬着陈毅遗像进行哀悼，同时还追悼了杨开慧烈士，矛头直指江青。

这是一幕多么悲壮伟大的群众运动的图景啊！

中国，这个伟大的祖国，同时又饱受苦难的祖国啊！自1958年以来，除了1962—1966年约四年较正常的发展外，从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人为的政治灾难经历了多么严重的创伤啊！一场动乱接着一场动乱，无休止地动乱着，而且张春桥叫嚷要“作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就是说要长期动乱下去。广大人民群众近20年来不得安宁，生产萧条、市场萎缩、商品稀少、社会混乱、前途渺茫，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周总理，半个多世纪来兢兢业业地把自己高度的智慧、无穷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在

民主革命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光辉的功劳。但他人格如日月行天，江河经地，光明磊落，从来不想突出个人，不写什么传世的著作，不树立个人的威望，把一切功劳都归给主席，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把全部力量扑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多次通过各种阴谋手段陷害总理，想打落他的威望，打倒总理，总不能得逞。总理洞察这一切，却逆来顺受，胸襟无比宽广，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恩怨，任劳任怨，一直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几乎无休止地工作着、斗争着，从来不知疲倦、不想休息，整个头脑里考虑着国际国内的大事。直到病危，仍孜孜不倦处理着国事，指导着工作，并且安排了能忠实继承自己遗志的战友作接班人。而邓小平受了总理嘱托，毅然担当了重任，挑起了国家的重担。邓小平文革初期遭受了极其严厉的侮辱，大多是无端的污蔑和攻击，受尽了委曲。很少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消沉，萎靡不振。但他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同样不计个人恩怨，以超人的气概和极旺盛的精力站起来干，短短一年来就打开了局面，气象一新，中国眼看有了一线生机，中国人民眼看能从无休止的灾难中解脱出来，然而……然而当总理遗骸的灰烬散落在祖国的大地上、江河里还没有冷却，就遭到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陷害、攻击，他的事业继承人就被无辜押上审判台，他的遗志也面临着覆灭的命运了。中国人民在总理的灵前感到无穷无尽的悲愤、失望，中国处于十字路口。但中国人民已不再是愚昧落后的人民了。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历史背景。这一事件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历史的光辉史册，激励我国今后世代人民继承这一斗争传统，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极其伟大的、繁荣昌盛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到底。

在王洪文指使下，一个政治小丑马小六指挥受蒙蔽的群众镇压了这场事件。当然事情远不简单，让今后的历史学家去详述一切吧。但几十万人斗争的惊心动魄场面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不会熄灭的。天安门广场上流满的鲜血不会白流。

人们仍以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例如，在事件以后几天，在上海最热闹的人民广场和外滩升起了悼念总理的白旗，当然，在上海悼念总理是犯法的。升白旗的人立即逮捕，抄了家。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被包围的广场里的人都受到了严格审查，失去了自由，死难的人一概被定为反革命。但是，人们都背地里有声有色地流传着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消息。我在一家新华书店里偶然发现的柜台里面暗藏着不公开出卖总理大幅遗像像片，买了一张，挂在写字台前面，每每有空就满眶热泪凝视着。你决不要以为我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深切地知道，即使总理健在能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或逝世后由邓小平执政，彻底贯彻总理路线，我个人的政治生命仍早已注定失去，成了政治上的牺牲品，绝无改善的希望；不过是想到整个国家的命运有了希望，这才是个人最大的安慰。在1967年初得知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卷入了炮打他的运动，1973年底我第二次被审查结束时，在揭发别人的材料里加了自己的想法，把张春桥痛痛快快地彻底咒骂了一顿。预定他不会有比林彪更好下场。总以为自己早晚要离开上海，脱离他的魔爪，他要报复也抓不到我，谁知道我长期不得解决问题，一直疑心他在捣鬼，不让我毕业走掉，我深知我一生的政治命运，是不会有太平的时候。

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在过几天的人民日报社论里，正式把“党内最大的”这个桂冠第一次加在邓小平头上，使他的帽子成为“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而原先根据3月25日的文汇报，是打算把这个桂冠加在总理头上的。

当然，以后批邓的恶浪越掀越高，一切舆论工具都环绕着批邓，实际上环绕着总理的路线进攻。我不想多谈这几个月的情况了，反正形势越来越叫人感到一片灰暗，前不久印发了那三个文件《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叫人们无休止地批判。这三个文件实际上全是由总理指示制定并提出修改意见的，其中凝结着总理的最后几滴心血。而上面传达称，这是主席亲自指示要全力加以批判的。

现在，形势已十分明朗，总理逝世，邓小平被撤职批判，叶老师被解除军委领导工作，一切舆论工具都掌握在姚文元一伙人手中，我国的前途在很长时期内将毫无生机和希望。我常想，与其这样与国家一样不死不活地混日子，还不如当初能有机会在天安门广场总理遗像前流尽最后一滴血算了。

我已经和你谈过了我国的历史发展、现状。我们只有了解了历史和现状，才可能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正确的估计，我想在这里描绘一下，因为这对我们今后如何生活下去（不管双方关系发展如何）会有点客观的依据。在工业方面，由于总理提出的将全国许多大型工矿企业集中到中央统一管理的方针被指责为搞“条条专政”，今后这些工矿企业将继续隔绝起来，彼此失去统一的有机联系，纳入到地方性区域里，这将加剧各地经济上的保守、割据形势，造成经济上的独立王国，企业也不可能管理好。既然利润作为企业活动运行的杠杆作用被取消，生产管理事实上处于混日子状态，成本核算最多只成为单纯的业务工作，不再为刺激改善管理的手段了。今后在分配制度上将要搞平均主义，使青年工人失去劳动积极性，对生产成果漠不关心，艺徒进厂也不会努力学好技术。根据王洪文的批示，青工将轮换去农村参加一段公社集体劳动，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中改造思想。商业职工也将定期去工厂参加劳动。工业分工将走向取消。规章制度越来越松弛，劳动纪律将散漫起来。

在农业方面，将越来越衰退。生产队越来越保守狭隘，成为封闭性的自然经济组织，分工进一步取消，医务人员参加集体劳动和分配，连教师也要半教半农，参加集体分配，连商业部门的农村下伸店，也逐步由农民管理，取消农商分工。甚至文艺工作者也搞“乌兰牧骑”式的花样，半农半演戏。在农业劳动内部，既然提出了“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必须会有“粮农不吃商品菜”的口号，一切类似的口号和措施都会出来，把生产队经济形态带到越来越原始、野蛮、闭塞的状态中去。婚姻只在最小的范围内进行，因为自留地把人比世界上最牢固的锁链还硬地束缚在土地上，少数相隔较远的夫妻，妻子必须经常来回奔波去娘家种自留地和收获。农民的自私观念在这种经济形态里越来越严重。《列宁选集》第一卷，有一篇引述索罗金俄国村社考察报告就描绘了这种自私心理。由于农村生产效率不会提高，会相比工业品生产效率而继续下降，工农产品剪刀差会越来越大，农民将一直成为我国最苦难的居民。

在科技文教卫生方面，也将每况愈下。科学研究人员、教师、医生将继续陷于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去不得安宁，除此外还得去物质生产部门定期长期劳动，去干校参加农业劳动。科研人员将不再去搞基本理论研究，教师将不教基本知识，搞什么“用典型产品组织教学”。总之，一切高级知识分子将永远处于心有余悸的心理状态下混日子。而学生们在学校里将参加大量无益的政治活动，出校门搞大量的单纯的生产劳动，文化知识水平将越来越低。青少年中流飞习气将更加蔓延。青少年犯罪率将不断升高。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将以毛远新的朝阳经验为样板。工科以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为蓝图，结果，理科综合大学就要被取消了。文科以社会为工厂，也将取消。大学招生将主要靠开后门，出去招生的人口袋里有一张名单，而招生地区也提出一张名单，协商解决。大学教师将成为社会上最动荡的职业，必须与学生开门办校到各处，又要当普通工人、社员，又要去干校，搞函授……

在文艺方面：将越来越枯燥，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将绝迹，代之以最没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粗制滥造品。文艺工作者将以“乌兰牧骑”为样板，取消专业工作者，半工半演，半农半演……，总之，文艺将失去它固的价值，成为单纯政治灌输的工具。

在国际交往方面：物质、精神交往将被切断一切渠道。

……

中国目前是处在解放以来最黑暗的时候，不知道何时会有尽头。历史看来在倒退，但总会前进的。我既然不能在天安门广场流血，那么就做一个历史见证人、旁观者，待有机会时，把我们一代人的经历和思想记述下来，留给我们的后代，使我们的后代在回忆我们的生活时，珍惜他们的生活，并启发他们更好地生活吧！

□ 王申酉（1976年11月18日至23日）

~~~~~

## 【史海钩沉】

吴宓日记中还有什么？

### 渔歌子

已经出版的《吴宓日记》，只是1949年以前的内容，而且据说其中还有一些令人遗憾的删节、“整理”。尚未出版的《吴宓日记》中还有什么内容？这是许多人都希望知道的。笔者从两位当年的知情人处了解到一点，即尚未出版的吴宓日记中，还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载。

在《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中，写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如何抄吴宓的家，如何对他进行批斗的情况，但作者未说明那是什么红卫兵。其实，在当时吴宓所在的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最初对吴宓进行抄家、批斗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个红卫兵组织并非造反派，而是中共重庆市委按中共中央西南局指示精神统一部署建立起来的，由学生中的“红五类”组成。后来这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造反派和一般市民鄙称为“思想兵”。

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起来了，“思想兵”迫于形势土崩瓦解。西南师范学院造反派组织“八三一战斗纵队”夺了学院大权。不久，“一月夺权”引发造反派分裂，“八三一”与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决裂，站到了“八一五”派夺权建立的“革联会”的对立面，遭到支持“八一五”的重庆驻军镇压，驻军扶持起西南师范学院中的另一派“春雷造反兵团”实行了反夺权。但不久全国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八三一”得到平反，重新恢复组织，并与“春雷”展开了殊死较量，双方从1967年6月起爆发了大规模武斗冲突。

大约就在武斗刚开始前后，在“八三一”勤务组（即领导班子的革命称呼）的一次会议中，有下属抱来几本吴宓日记，向担任“勤务员”（负责人）的一个学生请示，对这些东西应如何处理。他嘱咐他们不要销毁，要妥善保存起来，并顺手翻阅了其中一些内容。据他回忆，日记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如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对1959年至1961年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生活窘境所作的详细记载，其中有的日记详细记载了当天吃了些什么样的“代食品”（这是当年对一些替代粮食用以果腹的东西的统称，如糠、土茯苓、蕨鸡头之类），吞咽时的口感如何，腹中感觉又如何，拉出的粪便是什么颜色、形状等等。当时看到这些记载的人无不惊叹：“这老家伙真反动！”认为这是典型的“变天账”。

吴宓日记给这位学生留下较深印象的另一类内容，是有关西南师范学院文革情况的记载，其中居然对学院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作了详细分析，他回忆当年阅读时的感觉是吴宓“像做学问一样”，对两派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对照，日记中表现出感情上明显站在受到驻军压制的“八三一”一边。当时拿来吴宓日记的学生特地翻到这部份内容给这位“勤务员”看，说这个“反动权威”

居然在日记中表现出“支持我们”，若是让对立派知道了又会成为攻击我们的“钢鞭”。

另一位当年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的青年教师，文革中担任过支持“八三一”学生的教工造反团负责人，他当时也看过吴宓日记。给他留下较深印象的则是另一些内容：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有关文革形势的传闻，其中提到杨成武与江青有矛盾，还说杨成武的部队已从哪里往哪里开发之类。他当时看到后认为简直是无稽之谈，认为身受批斗监督的吴宓根本不了解外边的文革形势，他甚至怀疑吴宓已经被斗糊涂了。

两位当年都看过吴宓日记的人，留下较深印象的都有关于文革的内容（另有文章披露，文革中批判吴宓时曾在大字报上公布过他日记中“攻击文革”的部份言论，如说让中学生造反等于是把小刀交到小孩子手里一样危险之类）。可见吴宓虽在文革初期即遭到批斗折磨，却仍然坚持了记日记的习惯。至于他的日记坚持记到了何时，在日记中还具体记了些什么，就只有等待其日记全部公开出版后才能知道了。不过，令人担忧的是，这部份内容能得到出版吗？这些日记还在吗？

◇ 附：吴宓自述文革遭遇的一封信

吴宓先生给邹名璋侄的信

名璋贤侄：

1972年三月一日，宓忽接到侄电汇与宓贰拾元整之邮局通知单。三月二日上午，宓即至邮局取得人民币贰拾元整，甚为欣感。而以住址不悉，因循未即函侄，告知款已收到。……乃最近五月九日，宓又接到汇票9479——侄由“宁夏区医药公司”汇来壹拾元整。宓收到并已花用了。十分感谢，

宓月薪272.50元，而每月“特别扣发234元”。实只领得37、8元，故时觉经济紧迫。但“扣发”之事，乃是1970年9月，由中文系三位教师建议，因宓平生喜以钱财济助亲友，而自己毫无存留，故请革委会每月扣发234元，另行存储，不由宓支用。俟宓年老、退职之日，乃全数发还给宓——是一种“强迫储蓄”之办法。迄今为止，此项“扣发”之款，已积有伍仟元之多。而在任何时，倘宓有需用，只须写信呈请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批准后，即可领用壹佰元整（宓已如此作过好几次了），……所以宓的“经济困迫”，并不是真的“月入不足度用”，而只是因上言之“呈请……批准”手续，须费十几天。或值批准之……书记公出，不在学校则须等候。……总之，宓的“经济困难”不是真实的、全部的（故不需要亲友济助）；而只是偶然的临时的缺乏一点零用钱（只需向眼前身旁的熟人，通融五元、十元就足用了；而且，下月初发薪即可还清）。——此次，就是这样的情形。三月二十一日，宓写信向文英四嫂和果侄求借10元。因为四嫂果侄的地方，离宓最近，最快可得到，而到三月二十七日，宓已另外弄到钱了，便又写信去说宓不需要了；不必借了。……就是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小小的意思。微不足道。哪知四嫂和果侄太重视了，他俩却去通知远处的蕙芳大姐（你的大姑），而辗转求名璋侄汇来了10元给宓！这确使宓十分欣喜和感谢！但却是宓所意想不到的。不过宓想：在名璋侄的地位、收入、及家用上，30元不是个小数目；恐需要好几个月才积蓄出来，所以宓准备在六月、七月、八月初，分三次，每次汇还10元，——不知名璋侄的意见如何？

……

在1970年，当我们在一年中，不发给薪资，每月只给生活费10元之时，名偶侄间接晓得了，便自动地汇来20元给宓。——这和名璋侄的30元。是有同一的意义和价值的。……

宓今年七十九岁，身体极健强，内郡全好，不幸外部则（1）右眼1971年6月已全瞎了（医云：是白内障）。全靠一只左眼；（2）在1969年5月9日“斗争宓的大会”上。宓被夹持快跑中，左右两人皆急放手，而由后向前猛推。使宓栽倒在食堂的砖地上，扭折了左腿，虽经医疗，现在左腿上端和躯干连接处之关节。还是疼痛，走路必须右手拄着黄藤杖。可以走得很快。很远。另一方面。自进入了1972年，不再要宓写交代，写材料陈述自己的罪行和错误思想了。只是参加一般的政治学习和目前的运动，如“林陈反党、叛国案”之类。……明年1973年，宓年满八十岁，定要请求“退休、退职”了。先希望能回到北碚西师本校住着；后再回到陕西省家乡，生活由弟妹照料。宓自信可活到84岁，在1977年逝世。且看如何。去年5月4日，由北碚被派遣来到这个梁平县（川东、万县专区）的乡间，住在公路旁的工棚中。但好在是（1）宓一人独住一室，（2）有好友每天自作午晚餐，两人同吃，故饭食很好。生活现在可说“很满意”。宓有三女，皆不通音问。长女且公开宣布“和宓断绝父女关系”（是1971年6月的事）……拉杂写来，即康乐！

1972，五月十日下午

二姑父宓书

~~~~~

【往事追忆】

红卫兵小报和我（二十八）

• 周孜仁 •

（续上期）

25，战争无胜者

毛泽东曾如此定义，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1967年的中国国内八月战争，无疑是高层政治斗争流血的产儿。

自该年三月始，因“大闹怀仁堂”事件而引出的所谓“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运动，沸沸扬扬几个月，事实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各地军队仍旧普遍支持偏于稳健、甚至干脆就是改头换面的保守势力。对此，毛自是很愤然的。他必然想用一种激烈的方式打破僵局，因此便有了御架亲征、南下武汉之举；有了7月18日他对周恩来、谢富治、王力诸人宣称要对造反派发枪之说。“720事件”横空出世，毛仓惶避祸，此番刺激使他对军队问题定然已有骨梗在喉，不除不快之感。郑刚主编的《红色纪要》如是介绍：“毛看到一些部队明里暗里给保守组织发枪”，于8月4日，曾致函江青，再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应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先做，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应缓行，请提出与林、周和文革各同志从长讨论。”

此举对于急于翦除军内异己的林彪，自是正中下怀。而中央文革小组一帮弄臣，一旦摸准毛的脉相，当然也闻风而动，煽风点火，试图把1966年开始的地方动乱迅速引向全军。1967年7月25日新华社《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新闻稿，由关峰执笔、康生审定，明确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口号。六天后，8月1日，《红旗》杂志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提法更加直截了当：“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揭露出来，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社论明确声称：“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抛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对于和军队素有芥蒂、一般来说思想偏于激进的一派组织，（如重庆之“反到底”、湖南之“湘江风雷”一类），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始有江青号召，继而有理论支持，顷刻之间，全国上下顿时一派“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之声。1966年肇始的大乱，已使整个国家秩序丧失殆尽。而枪杆子，毕竟是国家最后的权威所在。军队被搞得灰溜溜，天下焉能再有宁日？日益升级的武斗，全国各地不绝于耳的轰轰枪炮，顺理成章成了“揪军内一小撮”这道政治风景线的背景音乐。

绝对的权威，必然是建立在绝对秩序之上的。毛破釜沉舟打碎原有秩序，是怀疑他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从而企图建立一个全新的、完全听命于他个人的秩序。真的将整个秩序彻底摧毁，他的绝对权威又毛将焉附？毛确实想打理一番军队，可稍一动作，便处处雷区：他不得不犹豫了。

“720事件”，他从东湖宾馆惶惶离遁。龙颜大怒之时，将武汉军区司令、政委陈再道、钟汉华揪北京午门待处；将闹事最凶的8201部队上万官兵悉行遣散，连人连编制全员取消（按：我的日记上曾记下了这么一个场景：“8201部队走（被遣散）的时候，都流了眼泪，车下送别的人也哭。”）可是，即便如此，毛对陈再道这个十恶难赦的叛臣还是“特批‘同志’称呼，并没被打倒，仅送去学习而已。”蹊跷的问题却是，不过一个月工夫，文革‘功臣’王力、关锋、戚本禹，“莫名其妙中倒被关了起来”（陈益南：《文革中若干尚不清楚真实内幕的高层人事问题》）毛泽东是在上海让代总长杨成武回北京向周恩来转达他的口头指示的。指示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1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对这些发生在京城的宫帏变乱，远处西南一隅的重庆，八一五和反到底的娃娃们当然浑然不知。这时，他们正好打得热热闹闹呢。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一份官方的结论性文档，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人名一律隐去，而用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代之：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晚，重庆市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武斗司令Y等人到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找到Q商讨武斗问题。Q立即召开勤务员会议……着重研究攻打重庆河运校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一线，以利固守沙坪坝地区。因武斗规模大，Q建议Y召开沙区片会，做出决定和部署；

“八月十六日上午，Y在市一中召开沙区各单位各头头会议……一致同意马上调集力量攻打河运校和潘家坪地区，并决定成立前线指挥部……各武斗队于十七日到指挥部报到。

“十七日下午，Q在XXX部队会议室召开武斗部署会议，决定重大301武斗队的榴弹炮阵地设在虎头岩上，一中、三中和二机校的武斗队埋伏于XXX部队与河运校之间……二钢厂等单位的武斗队布置在重庆医学院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一线……十八日拂晓发起总攻。

“十八日凌晨先使用榴弹炮和高射机枪射击各点后，开始冲锋。仅把河运校的武斗队打跑了，其余各点无进展。十九日凌晨又发动第二次总攻，也被对方打败。

“由于连续两天遭到失败，Q、Y又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派T去乐池调三七高炮，派Z去北碚搬“援兵”，W去空压厂调坦克车，二十日凌晨再次发动第三次总攻，亦未能奏效……”

“为了配合Q等人在大坪、潘家坪作战，八一五派空压厂头头Y等人将住在该厂的重大301武斗队33、34、35和37纵队调去攻打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此次武斗中，301武斗队的何孝柱、萧再光等八人被打死，方维汉等七人受伤。……”

这段文字所述事实基本可信，只是叙述语言似流露了过多的、本不应有的偏见，很像是当年一位对立派人士的叙述。可惜这确实是一份官方结论。我非常理解授意作文的个别当权者，因被同学们冲击过而愤愤难平的怨尤，可是这些死者，毕竟是他们的学生呀！对于这些年轻的生命，他们至少应该有起码的怜悯啊！更何况，年轻人从容赴死时所表现的信念（不管现在看来这些信念有多愚蠢），不正是这些当权者在政治报告会上喋喋不休教导的结果吗？

作为同学，他们的死讯带来的悲哀无疑是巨大的。8月20日上午，重庆大学815总团组织了一次报告会，由前线返回的同学介绍战地情况。会场设在冶金系的学生食堂，大厅空荡荡的，已经为数不多的留校同学静聚其中，坐着，整个世界鸦雀无声，只有演说者一顿一挫、掷地有声的发言。气氛尤其悲壮肃穆。我在当天的日记上记录报告会内容，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这个山头易守难攻，我们坚持了五个钟头，人都快昏死了。本来，我们是可以撤退的，但考虑到全局，考虑到伤员同志，因此我们一直坚持下去，直打到弹尽粮绝。/我们的同志牺牲很多，我们心里十分难过。我们一天都吃不下饭，我们要为他们报仇！”

前线指挥之一，L在会上非常沉痛地说，虽然战斗中对方死的人比我们多，但是，我们的同学都是多好的同志呀！我们一个换他们十个也不值呀。说得激越悲愤，声泪俱下。台下一片沉重的唏嘘和亢奋的呼喊。

王家大山的失利使全团震动。不管怎么说，一次战斗就死了这么多人。日后无论如何是难以交代的。总团于是当机立断：把上述四个纵队全部撤回来，休整！反到底派在军工企业里的势力毕竟太大，武器配置毕竟太强。速战速决已经不可能了。其时，北碚区已经完全控制在八一五的手中，甚至成了所谓“模范区”。再往西，合川、武胜、南充、广安……其中除了岳池县还被反到底控制，整个西线已全部联成一片。位居这片“红色根据地”的中南段，有一座华蓥山，地势险峻，危乎高哉，曾因罗广斌小说《红岩》而在全中国一举成名。解放前，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确实曾在此与国民党进退周旋，是个坚持游击战、保存实力、准备将来大反攻的好去处。——几番酝酿，重大八一五总团于是有了挺进华蓥山，建立长期战争根据地的设想。

就在这当儿，中央调查团来了。

时间是八月二十一日。组长叫陈斌，听说是总政治部什么人。还有一位团员，名唤温伯华，据说是周恩来联络员。调查团在重庆呆的时间一定很长，至少到11月份还没走。十一月四日重庆大学开了个“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二人都参加了。在11月15日出版的第46期《815战报》头版刊登的大会照片上，他们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重庆警司司令员韦统泰一字儿坐在主席台上。陈组长戴眼镜儿，瘦削，鼻略尖，很有些知识分子味。中央调查团的到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影响。文革大员谢富治、王力来了咱们照样打，小小陈斌算得老几呢？整个山城激战正酣，你们喜欢看热闹悉听尊便。警备司令部曾惠平、郝子义、张甲奎三处长及戚姓科长等七人被袭事件，就发生在调查团到达的第二天，即22日。是日上午十一时，七人陪中央调查团分乘四辆吉普由市革筹组返回警备司令部开会，车过两路口，被反到底枪手射击，二人死亡、五人受伤。《815战报》第38期对此事的报导原文如下：

“司机当场被打死。张处长身负重伤，送警司抢救无效，壮烈牺牲。郝处长被子弹击中肚

子，肚子被打穿四个洞，生命垂危。曾处长腿被打断。戚科长手臂受伤。”

那一天我的日记非常低调：

“中央的调查团来了……不知道这次来又会干些什么？我不明白。不过我对他们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本来今天中午是第一次接见两方代表，后来因故停开了。原因是砸派在两路口开枪射击警司首长，一人身死，三人重伤，他们都是师级干部（按：原文如此），这，也许是给代表团的一个见面礼吧。”

只是这次背景不一样，后果应该不一样了。前面说了，毛泽东已经感觉到了对部队动手绝非易事，风险殊大。毛说话喜欢云遮雾绕，前秦后楚，让人摸头不着脑，而他自己则永远立于正确之地。可这一回他批“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曰：“还我长城！”；批王力“八七讲话”，曰：“大、大、大毒草”。这些，好像不是信口开河了。他需要给枪杆子们吃一粒定心汤元，也对利令智昏的王力之流使个眼色，让他们稍事收敛。不管怎么说，他最大的一块心病：刘少奇败局已定。毛确实想稳定稳定了。中央调查团到达重庆的第四天，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即发布了《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运动的号召》。这个“中发表67（274）”号文件明确宣布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已经垮台了”；要人民务必搞明白：“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胜利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伟大的长城”。文件宣布：“人民解放军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是不允许外部的人进驻的。”文件警告：“要防止破坏，防止坏人挑拨离间浑水摸鱼”。总而言之，事关大局，在军队问题上，造反派是不能再胡闹下去了。文件最后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伟大领袖相提并论，齐呼万岁。

接下来，九月一日，周恩来及江青、陈伯达、康生诸人出席北京市革委扩大会议并发表谈话，声色俱厉地指出：“现在福州、广州、沈阳、南京、重庆很紧张，对野战军大军区司令员动不动就打倒，新调去的野战军马上受围攻，这里面没有坏人伸手怎么能令人相信咧？”（周恩来语）。任何场合都风头必出的江青在会上自然很动感情，她说了：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世界上哪有这样好的军队啊！你们夺他们的枪，到处抓军内一小撮……这是有阴谋的”。一个月前还雄心勃勃要“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康生，讲起话来更是寡廉鲜耻：“解放军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问题，他们想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完全是痴心妄想，是几个苍蝇碰壁。想动摇解放军，白日做梦”。

再十一天，即九月五日，上述四单位再次发文。这个中发67（288）号文件干脆就叫做命令了（俗称“九五命令”）。题目全谓：“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兵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除了重申“八二五号召”中的几个“不准”之外，更加肯定地宣布：解放军（对反军抢枪者）“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如劝阻和警告仍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为，应采取措施，对其少数坏头头和少数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拒捕和抵抗，人民解放军有权进行自卫还击。”

重新摘录上面这些资料，我发现一个问题：一贯以“紧跟党中央”、“大方向始终正确”自诩的《815战报》，对上述这类文件、“指示”刊登得十分详尽，而对于《红旗》杂志“八一社论”这一类“揪军内一小撮”的权威文件，却只字未载。我想不起这是印刷困难所致？还是对“中央精神”搞各取所需、断章取义？总之，事情反正已发展到了毛泽东高呼“还我长城”的时候，八一五当然又可以非常骄傲于它的一贯正确了。翻看那段时间的《815战报》，到处可以看到“举起双手，迎接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迎接伟大胜利的曙光！”（第四十期文章“编辑部就当前时局答读者问”）、“把砸派的坏头头和黑后台揪出来示众！”（同期“六五支队”文章）之类的呼喊。看到对于反到底派盛气凌人的教训：“交出黑后台可以，溜走不行！”（同期“指点

江山”评论员文章)

还是回过头来说中央调查团。

反到底派枪击警备司令部诸位处长这个“见面礼”确实起了作用。第二天，23日凌晨4点20分，中央文革办事组即紧急致电重庆警司并要求转交两派群众组织。这个电报指示刊登在《815战报》第38期上。原文如下：

“根据中央调查团的反映重庆武斗严重。

“1，必须立即停止武斗，希望两派做到立即停止对一切工厂、学校、商店、街道和居民点进攻和射击。请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立即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并撤出包围；

“2，绝对不允许对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

“3，双方立即达成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181页载，该电报稿是周恩来亲自审阅的。足见问题的严重性，亦足见这次来渝的中央调查团确实手眼通天，不同凡响。

电报中提到的空压厂，当时正被反到底久围强攻，形势岌岌乎殆哉。进攻方主力“军工井冈山”，人多势众，控制在他们手上的武器多而精良。这些优势让八一五大感头疼。“军工井冈山”原来不叫“军工井冈山”，叫“军工造反兵团”，发起人是江陵厂保守派组织“红旗”兵团。年初，2月10日，革联会如日中天之时，由“红旗”兵团的傅之光等人串联军工系统各大保守派组织整合而成。既然“老保”变种，其中自然党员多、干部多、转业军人多，人多而势众。2月12日，这批兵团团员决定集体倒戈投靠八一五，政治口号自然是“八一五好得很”“革联会好得很”之类。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八一五为着其组织的纯洁性，还有，革联会内本来就有了一个军工企业的正宗老造反：“八一兵团”——一个槽里同时栓两头驴，这就难办了一一两个原因相加，答案只能是一个：把热心热肠的“老保”们干掉！热脸蛋遇了冷屁股。军工造反兵团冲冠一怒，于13日立马再度转弯，宣布“八一五右了，修了”，正式投入“砸烂伪革联”的革命阵营。不幸的是，随着砸派领头羊“西师八三一”的倒霉，还在襁褓中的军工造反兵团便免不了被株连的命运——最后，被“伪革联”勒令解散：时间是三月下旬。

解决重庆问题的五条下达，两派都取得了合法地位，饱受冤屈的军工造反兵团当然需要为自己的政治权利重新抗争了。5月21日，军工井冈山兵团在重庆医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其时，重庆大规模武斗已箭在弦上。再度出山的军工工友为着保卫自己的政治权利，靠山吃山，以自己强大的武库为后盾，纷纷成立专业的武斗组织，如“红大刀”（建设厂）、如“金猴”（望江厂）、如“六月天兵”（长安），如“红色暴徒”（不知何厂，待考），等等。“井冈山兵团”凭借强大武力和精良装备，于6月2日，占领江陵厂，赶走了八一兵团65团；6月13日，占领嘉陵厂，赶走了八一兵团2301团（按：据我的日记记录，该厂于八月十四日被八一五派重新夺回，指挥为重大八一五勤务员吴庆举）；6月20日，占领望江厂，赶走八一兵团20团；7月1日，同时占领了建设厂和长安厂，赶走八一兵团6657团和16团。

如果当初，八一五派里面多一些政客幕僚，情况可能会好得多。政治场中的功利成败永远高于道德上的善恶之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这句名言，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单纯善良的中国老百姓才从这位资产阶级政客开诚布公的演说里得知。如果八一五当初接纳了军工企业的保皇大军，重庆文革的武斗史肯定会重新改写。但是后悔已经没有用了。八一五不得不接受面前的残酷现实——好在，中央调查团总算来了，八二五文件总算来了，他们可以高呼拥军爱民的口号，顺水推舟，体体面面地下台了。

只是反到底偏偏不给中央来人好脸色。尽管中央电文明确指出，要反到底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他偏不。血战一周，死人无数，好容易胜局在望，怎能轻易言退、功败垂成？反到底继续加强武力强突猛攻——而八一五，决定撤退了。方文正，空压八一兵团2602团的一号勤务员，身材瘦小，在撤退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他忧心忡忡地环顾四周，问：

地下室里那二十多个俘虏怎么办？

有人说：扔几颗手榴弹，把他们全部炸死算啦！

大约已别无选择，方，这个不苟言笑江西小伙子，同意了。

接着，他指名三个学生去杀人。只因敌方火力太猛，地下通道被封锁，行动延宕至第二天才得以执行。第二天，一个叫何大发的弟兄似乎清醒了些，对方文正说：全部炸死，太多了吧？把有血债的五个打死行了！

忧心忡忡的方文正看看他，又同意了。顺便叫他带那三个学生去速速行刑。何去了。

他们从地下室将五个人提出来，带到一个车间旁边，悉数枪杀。

死者之一邓X，是车间什么干部，他妻子刘素德已怀有五个月身孕。临刑前，邓哀求道：“你们把我杀了，不要杀我爱人！”，何没有理会这个素无怨仇的工友。邓又哀求，说“你们等刘素德把孩子生了再杀吧！”

全厂陷落在即，已经没有时间延宕。何说不行，接着一阵乱枪，五人全部被杀……

又二天，7月25日，空压厂被反到底占领。

让空压厂之战的失败者感到安慰的是，从空压撤除的第三天，八一五派以牙还牙，在北碚歇马场，把该地区反到底的最后据点：某军校一锅端了。缴获步话机等军用物资若干。八一五很得意地把这次胜利称为：“八二八歇马场大捷”。

一九六七年的重庆八月战争，至此算是基本告一段落了。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一场稀里糊涂的战争，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注定没有胜者。不管杀人者和被杀者，伤人者和被伤者，从本质上说来，他们在撕杀中所表现的真诚信念和献身精神都不过是被人欺骗和愚弄而已。真正应该钉上历史耻辱柱上的，是那些个别别有用心、煽动仇恨的人。而那时，他们正高高在上，手握权柄，他们总是胜利者。

只是，仅仅从表现形式来看，八一五没有从战场上得到的东西，轮到战后来获得了。毕竟中央调查团来了，毕竟“八二五号召”来了，毕竟“九一讲话”来了，毕竟“九五命令”来了。这些东西都在斩钉截铁地维护军人的权威。反到底呢？他们那么地沉不住气，喊过那么多让重庆军人怎么也无法接受的口号，诸如“揪出山城赵永夫！”“打倒黑警司！”“绞死匪首兰亦农、白斌！”之类。从六五事件抓捕连长陈干清等四人起，后来又有了八月三日望江厂人员用高炮击沉军分区交通艇致使3名军人罹难一案。还有八月十三日，同样在望江厂，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和两名战士被反到底人员打死一案。当然，还有就是八月二十二日两路口，警备区处长多人被袭一案……总之，现在轮到反到底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了。而八一五，洋洋自得，他们为自己是始终和军队站在同一战线而骄傲无比。

不管是颓丧，还是得势？其实，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实很快证明，所谓拥军派的暂时胜

利，也是毫不可靠的。要对付这帮无知的、充满政治理想的、初涉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实在是太简单了。记得初入大学，正值全国大饥荒，我记得我至少有两次饿得几乎昏迷。可政治辅导员站在讲台上一说：这些，全都是苏联修正主义作的孽！说：有志气的中国青年，要发愤图强卧薪尝胆！说：党中央说了，困难到此为止！我们马上就激动得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就饿着肚子穿着裤衩去和赫鲁晓夫拼命。1967年的8月，我们死了这么多人，我们曾经那么动摇不定，牢骚满腹，曾经对文革疑虑重重，甚至开始反感，但一听北京为自己说了几句好话，顿时又受宠若惊了——恰恰，正是这种虚妄的短暂的狂喜，催生了后来我那篇文章，像阴影一样笼罩了我整个人生的文章：“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